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 王昌林

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节能环保和数字创意等领域实现换道超车，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实现重大突破，对增加优质供给、扩大有效需求、促进高质量就业等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能。实践证明，我国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应用场景、科技人才资源和政治经济制度等优势。只要我们把握重大机遇，充分发挥优势，完全有条件、有基础、有能力在新赛道实现跨越发展。

也要看到，以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未来能源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将深刻改变各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加速全球供应链价值链格局重塑，全球范围内围绕人才、技术、标准、规则等的争夺将更加激烈，这给我国带来新的挑战。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与先进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现行政府监管体制、科技创新体制、产业政策等还不健全，不适应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要求，必须切实解决。如果不能抓住机遇，跟上新质生产力发展潮流，也可能在新赛道落伍。

要处理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三大关系

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把握战略机遇，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充分发挥优势，着力加强科技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着力推动体制机制创新，营造良好的发展生态，大力推动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促进经济发展向数智化、绿色化转型，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动力。在发展中要把握好以下三大关系。

一是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的关系。新质生产力主要是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催生的，是买不来的，必须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发展，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与此同时，由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科技、产业优势和劣势，同时新技术突破和产业化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等特征，只有加强创新链产业链国际合作、形成合力，才能更好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壮大。

二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产业化和初创产业不断产生、成长壮大的过程，需要政府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方面加强支持，在市场培育、应用场景建设等方面加强引导。但最根本的还是要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营造良好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充分调动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积极性、主动性。国内外大量实践证明，新科技革命的方向是很难准确预测的，只要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新技术、新企业、新产业等新质生产力就会不停“冒出来”。

三是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新质生产力主要是科技革命和产业深度转型的产物，它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会不可避免地带来负面影响，而由此产生的问题主要应在发展中解决。因此，必须平衡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一方面，要顺应世界科技进步和发展的潮流，鼓励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领域自主创新创造，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人工智能、干细胞和基因治疗等领域安全法

规建设，防止其野蛮生长，守好安全的底线。

推动重点领域实现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出了明确要求，要切实抓好贯彻落实。

一是发展数字经济，加快人工智能发展。充分发挥我国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加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要加快推动高端芯片、操作系统等研发突破和迭代应用，完善数据基础制度，推动公共数据有序共享和开发利用，促进平台企业规范健康发展。加快数字中国建设，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出台重要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实施细则，制定国家关键数据安全清单，建立数据跨境流动“白名单”制度，大力发展数字贸易。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战略高地，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要支持算法等原创性人工智能技术研究，建立健全自然语言处理、深度学习、机器学习等基础学科体系，加强人工智能数据、算力平台建设，积极推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加快培育发展人工智能产业。

二是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生物制造是利用生物体机能进行物质加工与合成的绿色生产方式，其发展正在推动化工、医药、轻工、能源等领域制造方式的深刻变革。要加快建立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审评审批机制，推进医疗产品和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价格形成和费用分担机制，激励生物医药企业创新。完善生物制造新技术和产品销售市场准入机制，推动生物催化工艺路线替代化学催化过程、生物基材料替代石化基材料，提升传统生物发酵产业效率和绿色化水平。航空航天产业是我国的重要战略产业，目前商业航天和低空经济正在成为大国博弈和科技经济竞争的重要制高点，呈现快速发展态势。面对新的形势，必须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加大航天前沿技术、核心技术攻关力度，适应商业航天规模化、低成本、快响应等特点，组织实施强链补链工程，破除政策制度壁垒，加快形成更加开放、安全的市场化、规模化产业生态体系。要建立健全低空空域管理制度，推进无人机等在农业、物流、旅游等领域应用，大力发展低空经济。

三是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未来产业主要是由重大科学革命引发技术革命，并进而推动产业革命所形成的新产业，代表未来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正如人类历史上爆发的电力革命、信息技术革命一样，未来产业的发展将推动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当前，未来产业总体处于孕育突破发展时期，我国与发达国家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面临跨越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要按照科研先行、创新驱动、应用牵引、国际合作的思路，在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氢能等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主动设计和牵头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和重大工程，鼓励自由探索，推动重点领域科学突破。要布局一批国家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要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和加速计划，实施产业跨界融合示范工程，打造未来技术应用场景，培育发展一大批独角兽企业，加速形成若干未来产业。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是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有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概括总结的一项重要重要的宏观经济治理规律，是对习近平经济思想新的丰富和发展，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稳中求进，具有重要意义。

一、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是对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规律的科学系统把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我国不断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宏观经济调控方式、方法和政策。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了“宏观经济治理”的概念，要求“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和“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2020年10月，“十四五”规划建议中要求“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

从“宏观经济调控”到“宏观经济治理”，这是党中央对新时代中国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化，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新的丰富和发展。与“宏观经济调控”概念相比，“宏观经济治理”概念更体现了系统观念的丰富和指导，目标兼顾更加多元，解决问题更为复杂，调控手段更为多样，时间跨度更为长远，涉及领域更为全面。从政策体系上看，“宏观经济治理”要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强调就业、产业、区域、投资、消费、科技、环保、民生、社会、改革、开放等各类政策手段合理分工、紧密配合、高效协同，从而对更为复杂的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引导、调节和控制。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进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必然要求进一步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高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

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最核心的一对内在关系，处理好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是一个健全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核心功能。供给侧管理政策一般要求从资本、劳动和技术这些生产要素入手，针对长期的、结构性问题，进行跨周期的宏观调控；需求侧管理政策一般是针对有效需求问题，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周期性、总量性的经济增长等进行短期性的逆周期调节。一般而言，从需求侧入手和从供给侧入手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区别在于把握经济增长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但是供给侧和需求侧政策又不是截然分开的，要实现稳定、可持续的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政策，通过供给侧管理政策和需求侧管理政策有效协同实现经济发展目标。

新时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一直坚持注重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发力。2015年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我国一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底最核心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这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意就是要通过持

续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突破制约高水平技术供给、制度供给的关键问题，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解决经济中存在的长期性、结构性问题，跨周期激发经济发展动力、提高潜在增长率，从而实现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目标。而从需求侧政策看，围绕着扩大有效需求，着力扩大消费和有效投资，持续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立足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培育更多经济增长动力源。

进入现代化新征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对扩大有效需求提出了新要求，要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这要求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全面促进消费，加快消费提质升级，优化投资结构，拓展有效投资空间，更好地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到2035年实现消费和投资规模再上新台阶、完整内需体系全面建立的目标。

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要求实施更加精准和前瞻性的政策。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通过增加跨周期政策设计来弥补单纯逆周期调节的不足，有利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一种供给与需求动态平衡、改革与管理高效统筹、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有效结合的经济运行体制机制，这些都深化了对宏观经济治理规律的新认识。

二、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是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的必然要求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蕴含着多元动态的目标，这些目标必须统一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上来，必须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安全的内在统一来把握发展、衡量发展、推动发展，必须始终保持全国一盘棋的大局观念，正确处理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更好统筹经济质的提升与量的增长，持续提升经济治理水平。而这必然要求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高质量发展，最终体现为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和美好生活的满足。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可以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扩大有效需求，实现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消费需求，实现更高质量更高层次的供需平衡。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衡量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是，一个国家GDP水平提高往往不能全面直接反映出收入平等、环境质量改善、减贫等人民福祉水平的提高。区分GDP所反映的经济数量增长与经常被经济统计所忽视的经济质量提升是至关重要的，经济质量主要体现在人民福祉改善。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界主要基于GDP数量视角延伸的经济增长模型和需求侧管理政策体系，不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这是新时代党对发展规律、我国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变化认识深化化的结果，是对单纯GDP数量导向的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和政策的反思和超越。

推动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并不排斥经济量的增长，我们所应避免的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模式下造成的具有环境污染、资源过度损耗、收入两极分化等问题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在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基础上，尽可能实现量的较快增长，不仅有利于持续提升民生福祉、增强综合国力，也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

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要实现这个目标，我国经济增长一定要保持合理的增速。有测算表明，要实现2035远景增长目标需要2021-2035时期年均增速达到4.73%，而且对于这一时期的前半阶段有更高的增长率要求。尤其是近几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等各种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速，2020-2022这三年平均增速为4.5%。这要求未来更要重视稳定经济增长速度。稳增长应该是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长期要求。因此，我们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同时，还要针对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着力扩大内需来稳定经济增速，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展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有效需求的协同发力，旨在实现经济增长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的统一。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会比较好地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上。全要素生产率所体现的是生产要素投入数量推进经济增长之外的、由于技术进步和资源优化配置而产生的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未来发展经济量的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因此，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关注经济增长率转向更加关注全要素生产率。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部分，特别指出要“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应该是我党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的着力点。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虽然目前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美国的70%左右，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只有美国的40%左右，这更增加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紧迫性。未来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一定要通过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三、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内需协同发力，是进一步推进经济回升向好的重要保证

2023年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着力扩大内需、优化结构、提振信心、防范化解风险，我国经济实现了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2024年要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风险隐患仍然较多等困难和挑战，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也在上升。这更要求我们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内需协同发力，提高宏观经济治理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一致性。

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内需协同发力，需要寻求扩大内需战略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结合去发力。从扩大内需看，要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协同联动，跨周期与逆周期宏观政策有机结合，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紧扣结构性问题，做到宏观经济政策更加精准有效，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有本金和债务约束的金融需求；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要围绕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突破供给约束堵点不断强化完善结构政策，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尤其是加快科技政策落地，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构建具有先进性、协调性、完整性、开放性、安全性和包容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内需协同发力，关键是要处理好扩大内需中消费和投资的关系。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投资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一方面，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扩大服务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大力

学界视角

坚持把握宏观治理规律
供需双侧协同发力

□ 黄群慧

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提振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大宗消费。另一方面，要完善扩大投资机制，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探索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建设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未来产业、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重点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基础设施、节能减排降碳，培育发展新动能。

当前着力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扩大居民消费。目前来看，制约中国居民消费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份额始终偏低，影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而居民收入份额与最终消费占GDP之比的走势高度一致，从1994年至2019年的历史数据看，中国初次分配中的住户部门收入占比与最终消费占GDP之比间的相关系数超过0.9，两者走势高度一致。因此，要扩大内需一定要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这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完整内需体系，高度重视就业优先战略和深化收入分配领域改革，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这些改革方向和内容既是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深化收入分配领域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内需协同发力的关键着力点。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